



◀ (上接 14 版)

画挺劲,结体斜耸而周正。

北魏铭石的楷书出自各地书手,虽然他们都是宗尚“洛阳体”,但各人自有书写习惯,刻工手法也不一样,故而形貌各异。即使一人所书,字迹或大或小,体势或正或斜,刻工或精或粗,也会生出异态。

近代康有为好用主观遐想追认北魏书作的美感,分别品等,而不辨当时正体与俗体的区别,不辨隶书和楷书的差异,不辨书作的先后关系。当下书家拾康氏牙慧,沉溺审美品评,也就难以了解北魏书法演进的真相。

北魏书风的变化,大体有两端:一是铭石书的主角由隶书变为楷书,二是楷书体势由“平划宽结”的“古质”变为“斜划紧结”的“新妍”。

这两个变化,北方落后于南方。

早在 5 世纪中后期,南方的铭石书已是“斜划紧结”的楷书当家。至于以“二王”为代表的敬侧迢美的新体楷书,则出现更早,且在 4 世纪末的东晋后期已经风行江左。

北魏书风之变,平城时期已有不自觉的渐变,例如《晖福寺碑》采用楷书,而且体态已显敬侧,就是渐变的痕迹。洛阳时期的书风与南朝接轨,出现幡然图新的骤变,那时的“魏体”楷书接近王献之《廿九日帖》(图⑦,局部)中的楷式。

北魏帝王贵族的“汉化”

北魏书风之变,不论平城晚期存在的渐变,还是洛阳时期的骤变,都与北魏帝王贵贵的“汉化”相系。

北魏是鲜卑拓跋珪在 386 年建立的王朝。398 年拓跋珪自草原盛乐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)迁都平城之后,君临汉族农耕地区,为了实施有效的行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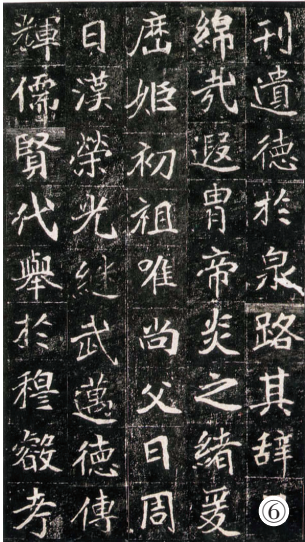


管理,迫于形势,鲜卑统治者不得不吸纳北方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。这些依附北魏的汉族士人则凭借文化上的优势,实现儒家的人伦理想。

《魏书·太祖纪》记载,拓跋珪称帝之初,在平城“营宫室,建宗庙,立社稷”,无不模仿“邺、洛、长安之制”。“初建台省置百官,封拜公侯、将军、刺史、太守,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”。“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,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”,又“集博士儒生,比众经文字”,采用“义类相从”的方法编定了一部四万余字的《众文经》字典。并且“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,立爵品,定律吕,协音乐;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、社稷、朝觐、飨宴之仪;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,申科禁;太史令晁崇造浑仪,考天象;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”。平城初期实施的种种安邦措施和文治政策,表现出鲜卑统治者服膺汉族文明的态势。

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代帝王,尤其推奖儒学。《魏书·太宗纪》记载:“帝礼爱儒生,好览史传,以刘向所撰《新序》《说苑》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,乃撰《新集》三十篇,采诸经史,该洽古义,兼资文武焉。”《魏书·燕凤传》记载,明元帝朝,“博综经史,明习阴阳讖纬”的燕凤与“崔玄伯、封懿、梁越等人入讲经传,出议朝政”。明元帝“素服寒食散,频年发动”,早逝。423 年去世的前几个月,还南下洛阳观看汉魏“石经”。

孝文帝元宏迁洛之前的 493 年,也到洛阳“观石经”,他的汉化程度很深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记载,孝文帝“雅好读书,手不释卷。五经之义,览之便讲,学不师受,探其精奥。史传百家,无不该涉。善谈庄、老,尤精释义。才藻富赡,好为文章,诗赋铭颂,任兴而作。有大文笔。马上口授,及其成也,不改一字。自太和十年(486)以后诏册,皆帝之文也。”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谈到孝文帝读书的情状:“臣每于侍坐,先帝未常(尝)不以书典在怀,礼



经为事,周旋之则,不辍于时。”孝文帝热衷汉族文化,其汉化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先辈,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做派,“遂使衣冠仰止,咸慕新风”。这新风,就是汉化之风,就是南朝的文风。

从《魏书》的大量记载可以看到,皇室和鲜卑贵族子弟的汉化程度,太和前后大不一样。太和以前,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,以弓马骑射为能事。太和以来,特别是迁都洛阳之后,鲜卑人尚武之风大衰,王公贵族子弟转而崇尚儒业,大有文才之士。著名者,元澄之子元顺,十六岁“通杜氏《春秋》,恒集门生,讨论同异”;“家徒四壁”,“止有书数千卷而已”,著有《帝录》二十卷,诗赋表颂数十篇”。临淮王元昌之子元彧,“少与安丰王(元)延明、中山王(元)熙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”。拓跋宗室宴集,也像汉族士人那样以赋诗为戏。

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,迁都洛阳之后发生了变化。孝文帝像南朝那样在东宫设立“侍书”,令善书的兖州人沈法会充任,辅导太子学习书法。这时,北魏学童识字、习字的字书也和以前不一样了。迁都以前,盛行的字书是汉晋相传的《急就篇》,北人“裁割缀连以为楷模”者,多是北方书家崔浩的写本。迁都之后,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顺,“九岁师事乐安陈丰,初书王羲之《小学篇》数千言”。王羲之《小学篇》是北魏后期出现的新字书,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也提到这本字书。《小学篇》既然冠以“王羲之”的名字,估计和南朝的《千字文》一样,也是“王书”的面目。鲜卑贵族子弟采用“王羲之《小学篇》”作为蒙学课本,表明北方的书法教育方面也出现了看齐南朝的新风气。

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,从迫不得已的被动到积极自觉的主动,与部落贵族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趋势相伴,与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同步。孝文帝亲

政后,认识到巩固皇权必须汉化,迁都洛阳就是提速汉化进程的重要步骤。北魏进入中原腹地,也是南朝书风在北方由隐而彰的背景。

北魏书家主体的转移

北魏前期任用的“文人”是晋室南迁后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和儒生。那些拥有社会势力的北方士族,尤以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影响最大。崔、卢是以儒业传家的文化高门、书法世家,故《魏书》说,“魏初工书者,崔、卢二门”,“魏初重崔、卢之书”。

崔、卢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两大书门。溯其书法渊源,崔氏法西晋卫瓘,擅长古文、篆书;卢氏法曹魏钟繇,长于隶书、行书、楷书。崔、卢各有师法,“而俱习索靖之草”。平城时期,崔、卢二门所传的书法体势已有一些变化:本是卢氏专长的行押书,魏初时崔玄伯已“特尽精巧”;楷书体,崔浩也有此专长;草书,卢氏在北魏初年已不能兼善;至于篆书,则一直是崔氏的专长。卢氏的优势大概唯有隶书。

清河崔氏出仕北魏比范阳卢氏早 30 余年,比较而言,崔氏书法的影响早于卢氏,也大于卢氏。

北魏初年,崔玄伯、崔浩父子居高官,预机要,当时天子诏令、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。我们还从《魏书》中看到不少世人争相宝重、楷模崔氏父子书法的明确记载。崔浩官至司徒,450 年被杀,株连一些北方大族,但学崔浩书法的崔衡依然得到献文帝的重用,擢为内秘书中散,职司书写诏命。出于卢氏的著名书家,平城时期仅有卢渊。

大体说来,孝文帝太和以前,北魏书家的主体是以崔、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。

我们还看到,自 5 世纪以来,就有一些东晋、刘宋宗室及名门士族避祸投北。5 世纪 60 年代,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占刘宋的三齐之地,将大量人口迁徙代京,这批“平齐民”中,崔光、崔亮、刘芳、蒋少游都是浸润南风的书法家,有的以佣书为业。他们将南朝书风带入北方之初,其书法恐怕仅限于自己的生活圈,或者稍稍流传于他们活动的区域,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,无从取代北方书家的主导地位。

孝文帝亲政后的太和年间,因为孝文帝倾慕江左文风,上流社会“咸慕新风”。当此之

际,北方的南士就有了用武之地。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,北方的南士获得重用,他们带来的南朝书风也就据有指导地位,于是“斜划紧结”的今体楷书成为铭石书的正体而迅速普及,江南盛行的“草隶”书法也风靡北方,这些南士成为北魏新书风的主导者。

后话

4 世纪南北书风形成分野之后,北魏接轨南朝的新书风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一个高潮。

北朝后期,北方裂为东西对峙的北齐、北周。那时,洛阳的汉魏石经搬运到北齐邺都(今河北磁县),成为北齐复兴古体书法的资源。北齐的铭石书复以隶书为时尚,南朝书风一度受阻。

北周书法仍然沿袭北魏洛阳时期书风。梁朝书法名家王褒入关引起轰动,“贵遊等翕然并学褒书”,这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二个高潮。从梁朝书风和王褒的师承来看,王褒的书法与宋、齐时代的南风稍有不同,故北周兴起的南风与北魏洛阳时期时兴的江南书风当有某种差异。北周灭北齐之后,王褒所传的南朝书风又波及北齐故地。

但是,自北魏洛阳时期兴起新书风以来,北方始终没有产生可与南朝著名书家比肩的人物。

隋文帝取代北周 8 年后的 589 年,隋朝灭陈,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。江南书法名家如欧阳询、虞世南皆北上仕隋,江南建康具有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,而全国统一之后的主流书风仍是南朝书法。

(作者为书法研究者) ■

